

音容宛在 风范永存

——忆方毅同志在中国科学院

郭日方*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 北京 100864)

关键词 方毅,中国科学院

1997年10月17日晚,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来电话告知,方毅同志下午3时07分在北京医院去世,约我商谈撰写方毅生平事宜。噩耗传来,我木然地坐在电话机旁久久说不出话来。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长期在方毅身边工作,在他协助邓小平同志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他为医治“四人帮”破坏的创伤,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坚决进行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在朝夕相处中,他言传身教,处处关心爱护身边工作人员,使我亲身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彩照人的品格和作风。方毅经常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为我们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在战争年代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即使被国民党打入死牢,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依然不分昼夜,忘我工作,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1 受命于危难之际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倒行逆施,使我国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科学家被关进了“牛棚”,去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许多研究所被肢解下放,科研设施损坏流失,科研工作被迫停顿,科技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方毅奉中央之命,由外经部调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治理整顿。

“文革”的遗留问题堆集如山,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谈何容易。方毅初到科学院的一段时间里,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更好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在精神上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投身于祖国的科技发展事业。

小平同志说,要抓科学和教育,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否则如何开动?为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曾多次表示要给大家当好后勤部长。方毅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搞好后勤保障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以信访为例,在粉碎

*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曾任方毅同志秘书

收稿日期:1997年11月26日

“四人帮”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每天上访告状、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人应接不暇,每天都有上百封信件寄到方毅办公室,一些重要信件方毅还要亲自批阅。他常说,拿人民的俸禄,就要为人民办事。为加强信访工作,他亲自召集信访处人员开会,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在最忙的一段时间,还从一些部门抽调思想素质好、政策观念强的加强信访工作。一次,我刚到办公室,接到“九一七”大楼一位科技人员的电话,他气冲冲地说:“现在是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我们‘九一七’大楼没有暖气,水管冻裂,污水乱流,院领导管不管呀?!”我立即向方毅作了汇报,当他了解到“九一七”大楼有几个研究所数千名科技人员和家属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心里非常着急,让我尽快通知院有关领导来开紧急会议,他带领有关人员深入现场,就地办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年春节,天气格外寒冷,方毅带着我利用春节假期走访了很多科学家,还特意到中关村地区供暖锅炉房看望了值班的工人,询问春节供暖情况。

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在邓小平支持下,方毅为科学院办了大量实事,使广大科技人员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文革”中,一批研究所被下放到地方,许多科技人员学非所用。为解决这个问题,方毅多次给邓小平写信。正是在他们的关怀下,一些研究所重新划归科学院管理,中国科技大学被占用的2万多平方米校舍归还给科技大学。为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邓小平、方毅让国家有关部门帮助科学院盖宿舍,解决了400户两地分居问题,还批准科学院建立一支基建队伍。1979年9月9日,方毅给邓小平写报告反映,科学院需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但国家外汇紧张,历年分给科学院的很少,影响科研工作,科学家们感到焦虑,建议将科学院各所、科学出版社和科委情报所等单位这几年的外汇收入,全部留给科学院用于进口设备。邓小平立即批示:“我认为应全力支持。”还是在他们的关怀下,著名半导体专家黄昆教授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任所长,还专门调来了党委书记和负责后勤的副所长,使半导体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又如著名声学专家、原声学所所长汪德昭,也是在邓小平、方毅的关怀下,实现了恢复国防声学研究的愿望,使我国水声学特别是浅海水声学理论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短短几年里,他为科学家们办的实事不胜枚举,一件件,一桩桩,都铭记在科技人员心中。

方毅来中科院后,还为院机关解决了长期没有礼堂开会、没有食堂吃饭的问题。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他亲自召开办公会,审查设计图纸,调来基建工程兵,用不到一年时间,在机关大院就建起了今天这座多功能礼堂,上层可以开会,下层可以吃饭,方便了院机关广大职工。中关村大礼堂的改造,也是在方毅同志的关怀下完成的。

方毅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腔热忱,对“四人帮”及其爪牙深恶痛绝。“文化大革命”中,方毅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而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他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后,在竭尽全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按照中央指示,旗帜鲜明地开展清查帮派势力,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欢迎。他一方面抓紧平反冤假错案,一方面抓紧组织揭批“四人帮”。有些重要的批判会、落实政策会,他都要亲自参加并发表义正辞严的讲话。当他得知一些科学家还在扫地劳动、学非所用时,非常生气,指示有关负责人尽快解决。当听说长春光机所的帮派势力把大批科技人员打成“反革命”时,亲自同吉林省委联系,传达小平同志指示,为所有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他支持“四五”运动中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行动,并亲自主持了庆祝“四五”运动伟大胜利的大会。他对胡耀邦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技工作汇报提纲”给予充分肯定,指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他全力协助小平同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

虑,发表了著名的“八·八”讲话,集中讲了对十七年的估价、调动积极性、体制、机构、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和学风等方面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方毅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做出决定,彻底否定“四人帮”对文革前十七年科技工作及广大知识分子所做的错误估计,在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如恢复出国留学制度、取消革委会、撤消政治部、实行所长负责制、恢复学部活动、恢复学术委员会、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等,为科学院医治“文革”创伤和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在教育方面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1977年9月5日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把科技大学建成一个能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对入学新生要严格考核、择优录取等当时其它大专院校尚未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二是同年9月10日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对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待遇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这两个报告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付诸实施。中科院在贯彻执行邓小平教育思想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邓小平还表扬过中国科技大学办得好,特别是创造性地举办了本科少年班。后来,方毅到科技大学视察时,专门接见了少年班的同学们。

从1977年9月到1978年3月,方毅全力投入筹备和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亲自深入各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倾听广大科技人员的呼声,了解科技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科学大会预备会议,请来各省区市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听取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他还亲自领导了科学大会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正是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 走进科学的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科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人们都在思考如何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科学技术如何面向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科技界领导和科技人员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根据科学家的建议,为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报经中央批准,首先恢复和重建国家科委。国家科委重新成立后,他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制订科学技术工作的新方针,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并满腔热情地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部署了一批大的科学工程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他还积极推动学位和学术职称制度的重新建立,主张恢复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提出对优秀教师授予特级教师称号;提倡加快高等教育建设,发展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鼓励多种形式办学,广开培养人才之路。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促进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他从1978年起连续9年,每年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他常对我说:“我国的三大共生矿,只要我管这个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活一天就要过问一天。”他还说:

“现在很多外国领导人邀请我出国访问,我想这几年主要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国外尽可能就不去了。”一次,他要到包头稀土矿去参加综合开发研究的会议,适逢雷雨天气,飞机无法起飞,为了不误会期,临时改乘火车,颠簸一夜,才到包头,到住处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长期患糖尿病和神经衰弱,心脏也不好,身体非常虚弱。在包头刚开完几天会,就直飞金川。金川当时还是一片荒野,连一棵树都没有,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他不顾年迈体衰,深入到矿山,仔细询问各种问题。他要下矿井看一看,矿山领导怕不安全,劝他不要下去,他说:“哪有抓矿山科技而不下矿井的道理?”到了井下,他亲眼看到巷道已坍塌成狼牙洞,积水没膝,开采条件十分恶劣,感到非常不安。在那次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对金川镍矿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讲了三句话:“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向与会者提出:“希望尽快拿出成果来。”“谁最经济,谁最合理,谁流程短,回收率高,我们就采用谁的。”在他的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技攻关在金川拉开了序幕,从此,金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89年,“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1年,金川公司获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

其实,何止一个金川。他对攀枝花矿钒的提取、钛的富集、氯化后制钛白等工序进行了大规模试验的部署,对二滩电站初期的考察,对包头稀土矿的综合利用,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天,这些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巍巍矿山不会忘记,这位曾经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在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主战场上,又为党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方毅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还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亲自过问和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重离子加速器工程,并领导和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研究与开发。对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数学研究满腔热忱地予以鼓励和支持。著名作家徐迟的那篇描写陈景润的《论歌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就是方毅组织一批国内著名作家热情讴歌科技工作所创作的许多文艺作品中的一篇代表作。他还前往敦煌,帮助常书鸿先生研究如何开展敦煌学的研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保存敦煌壁画。白暨豚是我国的珍稀动物,为了支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开展保护白暨豚的研究,他找到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特批200万元专款修建了武汉水生所白暨豚馆,并亲自题写馆名。

方毅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没有上过几年正规学校。但是,由于他勤奋好学,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外语,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最终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深谙管理、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一天的繁忙工作之余,他有两件事情是雷打不动的。一件事情是学习外语,听英语广播,每次半小时。一件事情是学习书法,每次也是半小时。长期坚持不辍,孜孜不倦,后来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在同外国人谈判时,时常用英语直接对话,有时还纠正翻译的错误。晚年还在厦门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出版了书画专集。

方毅同志走完了人生81年的光辉历程,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他坚持真理、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崇高品德,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虚心好学、深入踏实、廉洁奉公、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